

Venture To the 风之 Interior 家族



——非洲内陆的最后长征

[南非]劳伦斯·凡·德·普司特 著
LOURENS VAN DER POST 蔡佩君 译

非洲，一片广袤恢弘的浩瀚大地，
深藏着难以描摹的历史厚重影像，
具有非凡勇气的探险家兼作家劳伦斯·凡·德·普司特，
引领你深入走入这场瑰丽跌宕的戏剧，
共同承担起寻找生命原形的使命……

Venture
To the
风之 Interior
家族



——非洲内陆的最后长征

[南非]劳伦斯·凡·德·普司特 著
LOURENS VAN DER POST 蔡佩君 译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

VENTURE TO THE INTERIOR ©1952 by Laurens Van Der Post

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by CHATTO & WINDUS,
one of the Publishers in The Random House Group LTD. in 1986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HATTO & WINDUS,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7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CHATTO & WINDUS, one of the Publishers in The Random House Group LTD.
授权重庆出版集团·重庆出版社在中國大陸地区独家出版发行,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, 本书的任何部
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、节录或翻印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版贸核渝字(2006)第 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之家族: 非洲内陆的最后长征 / [南非] 普斯特著; 刘丽真译.

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7.5

(旅行与探险经典文库)

书名原文: Venture to the Interior

ISBN 978-7-5366-8501-7

I. 风... II. ①普...②刘... III. 游记—作品集—南非(阿扎尼亚)—现代 IV. I478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22225 号

风之家族——非洲内陆的最后长征

FENG ZHI JIAZU

[南非] 劳伦斯·凡·德·普斯特 著

刘丽真 译

出版人: 罗小卫 丛书策划: 周英斌

责任编辑: 周英斌 王英姿 责任校对: 周英斌

装帧设计: 曹颖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10mm×1000mm 1/16 印张: 15.25 字数: 240 千

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66-8501-7

定价: 2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809955 转 8005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Preface

行万里天涯路 念天地之悠悠

——《旅行与探险经典文库》序

葛剑雄

好奇是人类的天性，求生是人类的本能。原始时代的人类生产能力极其有限，生存能力低下，只能经常性地、无目的地迁徙。在此过程中，应该有大量自觉与不自觉的探险经历。可惜年代久远，当时又没有文字记载，所以即使是世界上一些文明古国或拥有辉煌古代文明的民族，也没有留下早期的探险记录。

司马迁在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中称黄帝“东至于海，登丸山，及岱宗。西至于空桐，登鸡头。南至于江，登熊、湘。北逐荤粥，合符釜山，而邑于涿鹿之阿。迁徙往来无常处，以师兵为营卫”。黄帝的踪迹东至山东半岛，西至今甘肃，北至今内蒙古，南至湘江流域。如果

将此记载看成一个以黄帝或其部落为首领的部落联盟的活动的
话,其中应该有不少探险事迹,只是当事人未必有自觉的意识,或
者虽有而未留下记载。

不过从《山海经》的内容可以看出,古人并非没有探险,也不是
完全没有记录。学者对《山海经》的成书年代的看法分歧很大,但最
迟不会晚于西汉,其中包含的原始资料则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代。
一般认为,《山海经》所记述的地理空间基本不超过今国界,但涉及
的范围却相当广阔,自然包括了不少境外的奇闻趣事,其中总该有
得于记录者直接的经历。从这一意义上说,《山海经》是中国早期探
险记录的汇编。如果认为《山海经》的内容过于荒渺,那么在内地,
甚至沿海发现的和田玉则是实实在在的存在,说明早在新石器时
代,已经有人将产于昆仑山的玉石运到数千公里之外,其中肯定有
不少探险故事。

《穆天子传》尽管未必是周穆王的经历或当时的记载,但至少
反映了先秦时代中原人对西方的向往。而其中记录的内容,也或多
或少显示了当时人的地理知识和丰富想象。昆仑山、西王母被神
化,固然与人们的愿望有关,但不能完全脱离现实的基础,说明当
时的人还习惯于向外界寻求精神和物质财富。生活在战国后期的
屈原,尽管游踪有限,但从他的作品中却不难看出他的探险精神。
在公元前 221 年完成一统大业的秦始皇,虽然正式建立了中央集
权的皇帝体制,却是皇帝中为数不多的旅游和探险爱好者,对自己
统治范围以外的地方也有浓厚的兴趣。在灭六国后,他几乎没有停

止过全国性的巡游，最终死在途中。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，一批方士扬帆远航，虽然他们始终没有为秦始皇找到不死药和神仙，却由徐福完成了一次至少有数千人的大规模移民。

汉武帝时代的开疆拓土一度激活华夏诸族的外向意识，被誉为中国第一探险家的张骞，正是奉武帝的政治使命，尝试联络已迁至中亚的月氏夹击匈奴，才意外取得“凿空”——通西域的伟大成果，将中原人的足迹远推到大宛、乌孙、大月氏、大夏、康居、安息、身毒等地（今新疆和哈萨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、塔吉克斯坦、阿富汗、伊朗、印度、巴基斯坦等国），所了解的地理知识范围更大。而武帝本人也步秦始皇后尘，在国内广泛巡游，并且特别钟情于边境和海滨，显示了他对外界的强烈向往。

但秦始皇、汉武帝式的帝王从此成为千古绝响，随着中央帝国的巩固和疆域的扩展，由皇帝到臣民，对境外的兴趣越来越淡薄。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地理等各方面因素考察，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。从汉朝至清朝中期，中国都是亚洲乃至世界最强大、疆域最辽阔的国家。特别是在东亚汉字文化圈内，朝鲜、越南等政权都是中国的藩属，日本也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，直到明治维新时还无法望中国的项背。太平洋、青藏高原、横断山脉、欧亚大草原给中国提供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。直到16世纪西方的远洋船接近中国之前，还没有外来势力构成对中国的威胁。北方的游牧民族虽然曾不止一次成为军事上的征服者而入主中原，但最终无不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。虽然中国的人口在12世纪突破1亿，17世纪

突破 2 亿, 19 世纪突破 4 亿, 但完全可由本国出产的粮食供养。除少数奢侈品外, 中国的物产中心能满足全国的需要, 对外贸没有依赖。所以当英国向乾隆皇帝提出在北京设立常驻贸易代表时, 理所当然地被断然拒绝, 除了体制上从无先例外, 一个重要的依据是“天朝无所不有, 无需仰赖外人”。儒家的“夷夏之辩”和“五服”学说, 更加深了这样一种观念: 天下再也没有比中国更文明富裕的地方, 除了华夏诸族和中原王朝的疆域之外, 其他都是蛮夷之邦和要荒之地。

长期处在这样一个环境, 中国人自然失去了向外寻求财富和文明的动力, 更不会想到要到境外去旅游或探险。就是在汉唐盛世, 号称中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时代, 也只是敞开大门让境外的人进来, 而不是同时允许甚至鼓励自己的臣民走出去。在外贸发达的唐宋时代, 外贸商人也主要来自外国。当西方商人已经敲响中国的大门时, 明朝的反应是“片板不许下海”的禁令, 以致福建沿海的商人只能采取武装走私的手段而成为“海盗”, 甚至雇佣日本武士形成“倭寇”。尽管 600 年前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七次“下西洋”, 远达西亚、东非, 却连完整的档案都没有保存下来, 更没有像哥伦布那样导致新大陆的“发现”。

与中国悠久的历史, 强大的国力, 众多的人口, 发达的文化极不相称的一个现象, 是直到进入现代社会以前, 中国始终没有出现职业旅行家和探险家, 现存的有关境外的记录都是非职业旅行家和探险家的副产品。例如, 张骞、《中天竺国行记》作者王玄策、《真

《腊风土记》作者周达观、《西域行程记》作者陈诚、《异域录》作者图理琛是外交官；《佛国记》（《法显传》）作者法显、宋云，《大唐西域记》作者玄奘是往西域取经的虔诚佛教徒；《经行记》的作者杜环是恒罗斯之战的俘虏，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的作者李志常是奉召谒见成吉思汗的道士丘处机的随员。他们的记载往往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或唯一的，如《大唐西域记》中有关今阿富汗境内巴米扬大佛的描述，不仅证实了大佛建造于公元7世纪，而且还给今人提供了附近另有一尊卧佛的重要信息。要是没有《真腊风土记》对吴哥城的记载，这座古城也许会继续掩埋在热带丛林中。这些记载的产生和保存也有偶然性，如玄奘返国后就要翻译佛经，要不是唐太宗专门下令，就不会撰写《大唐西域记》。《岛夷志略》作者汪大渊或许是例外，他是因“好游”才多次出国的，不过他有幸搭乘外国商船，否则就只能梦游或卧游了。

真正的异数是徐霞客，他是唯一称得上职业旅行家和探险家的人物，并且留下了具有非常高地理学成就的著作《徐霞客游记》。但他的成就得益于一系列特殊因素：科场失意使他不得不绝意功名，富裕的家境使他能有充足的旅费，能干的母亲使他无家累之忧，对知识分子的优待使他能在旅途享受不少公费或私人接待，友人名流使他的著作能在身后流传，现代地学家丁文江的发现和表彰使他的地理学成就得到肯定和发扬。只要缺少一点，或许就没有今天大家了解的徐霞客了。不过徐霞客的足迹没有超出当时两京十三布政使司的范围，连西藏也没有到，更不可能出国探险，

这也是历史的局限所致。

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不具备实施探险的能力。至元十七年(1280),元世祖忽必烈想查清黄河的源头,在那里建一座供吐蕃商人与内地贸易的城市,并设立转动站,下令都实与阔阔出两人率队考察。他们于当年4月从河州(今甘肃临夏市东北)启程,四个月后来到达河源,冬天返回。此后潘昂霄根据阔阔出的口述写成《河源记》,将黄河的正源确定在星宿海西南百余里处,对黄河最上游的水文、地形、地貌和人文景观的记录已相当具体准确。乾隆四十七年(1781),阿弥达受命探寻河源,以便就地祭祀河神。这次的探险将黄河正源定在星宿海西南的阿勒坦郭勒,即卡日曲,与1978年青海省政府组织的考察结果完全一致。这证明中国长期缺乏探险传统,中国人不能去境外探险的根本原因,还是缺乏现实的需要。

反观世界上一些航海、探险发达的国家,探险的范围广、产生探险家多的民族,无不有其深远的传统和迫切的需要。例如,古代地中海沿岸国家无不以对外贸易为致富手段,以对外殖民和扩张为立国之本,其前提是这些国家的本土一般幅员不广、资源匮乏、耕地有限,甚至连水源都不足。而穿越地中海的航行并不困难,海外的土地、资源和人口自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。以后,阿拉伯、西欧、北欧一些国家致力于航海和外贸,大批航海家、探险家不顾艰险寻找环球航路,发现新大陆,也无一不是出于国内的生存压力和扩张需求,无不以夺取土地、奴隶、黄金、木材、矿产、市场、要塞、殖民地为目的。连早期的南极考察也是如此,甚至是为了猎杀企鹅获

取制皂的油脂,出售海豹的皮肉牟利。但是正是这样卑鄙邪恶的目的,促成了新大陆和南极的真正“发现”,造就了不少杰出的航海家和探险家,也在一些国家和民族中形成了探险的传统。在这样的条件下,职业探险家,包括一些纯粹出于人文和科学目的的真正的探险家应运而生,有的不惜为之献身,成为人类的骄傲,他们的记录和著作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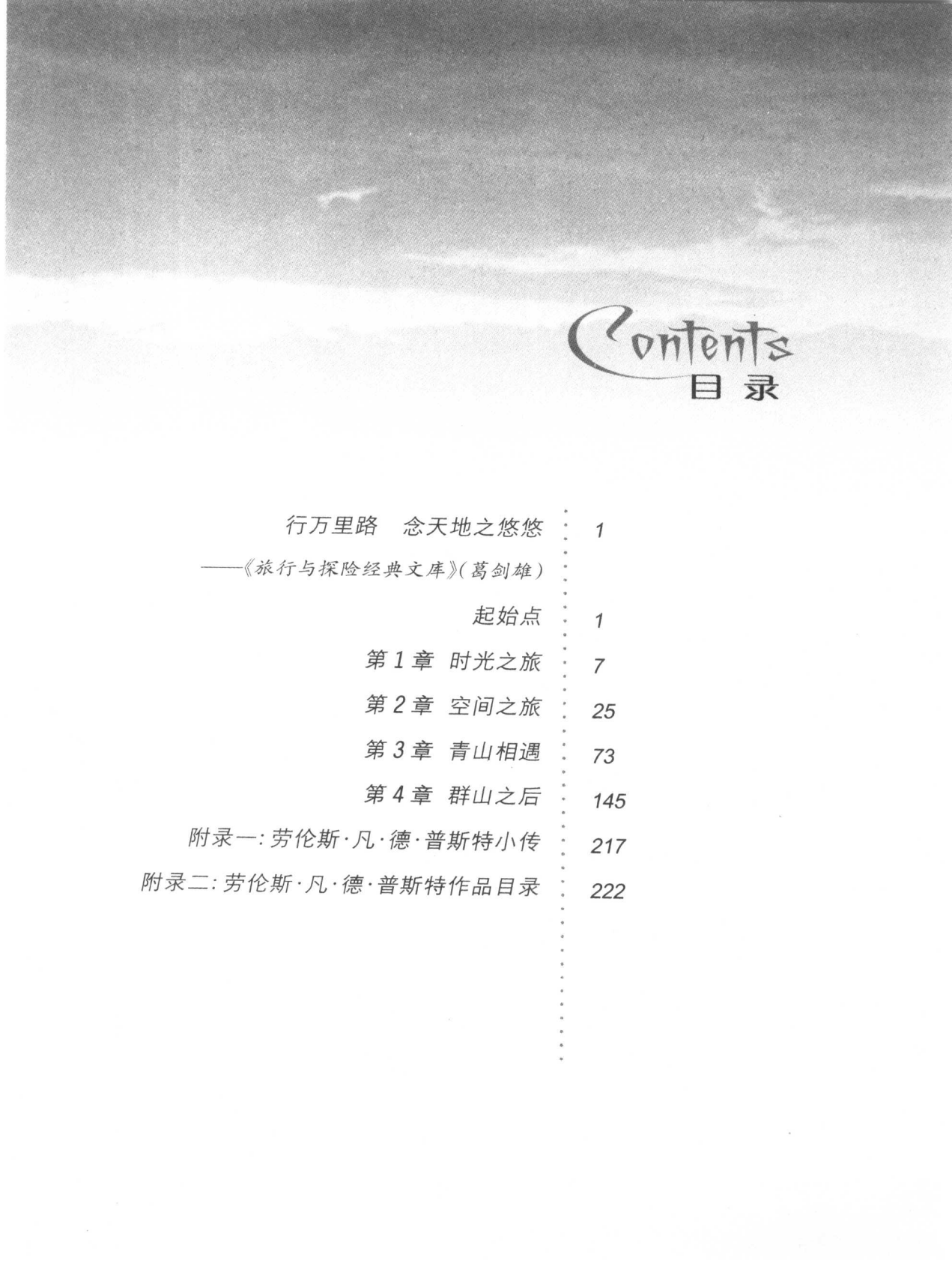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拥有优势或长处,也不可能始终先进,所以都必须向其他国家或民族学习。应该承认,直到今天,中国的探险事业还比较落后,中国人在世界范围的探险还很有限。2000年我参加中国第十七次南极考察队去长城站期间,就受到很大的震动。当然,中国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向世界,在地球的两极,全球所有的高峰、五大洲、七大洋都已留下了当代中国人的足迹,在中国出现世界一流的探险家指日可待。但历史无法重复,了解人类以往的探险经历和经验不可或缺。而且由于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变迁,以往探险家记录的现象有的已永久消失,只能从他们的书中领略了。

重庆出版社新近推出的《旅行与探险经典文库》,其着眼点显然正在于此。该文库融探险、考古、文学、文化人类学于一体,既勾勒探险家们多姿多彩的极限生涯,也凸现积极向上的个人英雄主义,更重绘人类文明不为人所知的曲折发展图景。该文库预计推出两辑,首辑推出的十本新书中,有20世纪最为激动人心的抢险经典海尔达的《孤筏重洋》《太阳号草船远征记》《复活节岛的秘

密》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坦贝克冷战时期的涉除名作《俄罗斯纪行》，有勘探成吉思汗古老帝国秘密的冒险旅行《寻找成吉思汗——骑马横越蒙古大草原》，有复原名著《白鲸记》惊险氛围的《寻找白鲸记》，有追溯著名探险家维迪亚生平足迹的《维迪亚爵士的影子》等等。稍后即将推出的第二辑，在继续关注名家名著的基础上，更注重地域性、民族性以及探险方式的独特性，在提炼个人探险经验的前提下，将世界各地文化的丰富多彩与人类生存方式的多种多样，更真切全面地描绘出来。

这些探险作品涉及范围之广泛，记载内容之丰富，情节之生动惊险，描述之细致传神，只有读过的人才会有体会。无论是为了科学研究，积累知识，还是为了陶冶性情，欣赏休闲，都会开卷有益。与一般读者相比，我的游踪或许较广，但我自知对这套书中涉及的地方，大多是这辈子都到不了的。2001年从南极返回途经智利时曾想去复活节岛，因多种原因未去成，不知今后是否再有机会，好在第一辑中就有《复活节岛的秘密》一书，多少能够弥补我的遗憾。

2005年6月5日



Contents

目录

行万里路 念天地之悠悠	1
——《旅行与探险经典文库》(葛剑雄)	
起始点	1
第1章 时光之旅	7
第2章 空间之旅	25
第3章 青山相遇	73
第4章 群山之后	145
附录一: 劳伦斯·凡·德·普斯特小传	217
附录二: 劳伦斯·凡·德·普斯特作品目录	222

起始点

1949年5月10日清晨,我满怀愤恨,坐在候车室里。二十来个人跟我在一起,等候巴士接我们去希斯罗(Heath Row)机场。我很痛苦地发现,我的生命再次违背了我理性的计划。我的苦楚或许有些自作自受,但是,听完我的解释,你或许可以了解我的苦衷。1940年,我入伍服役,离开英格兰之后,就一直渴望,也一直计划回到这里。但是,我的命运完全不理睬我的想法,1940年到1945年,我足迹未履故土。

我自己的战争,把我带到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偏僻角落,距离英格兰越来越远,回家也跟着越来越没指望。我就这么一路颠沛流离,在阴差阳错的时机中,在最无可奈何的命运里,从阿比西尼亚^①的敌后,到西非沙漠、叙利亚,与外约旦^②的血战前线,从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蛮荒丛林,又到日本战俘营数年的禁锢岁月,数年之间,不得安宁。1945年8月,对大部分的百战老兵来说,战争终于画上句点;但是,我的战事却尚未终结。为了个人的信仰,我又卷入爪哇与苏门答腊的内乱中,直到1947年才得脱身。

1945年10月,蒙巴顿爵士(Lord Louis Mountbatten)派我回伦敦两个星期,向战争内阁与首相面报东南亚情势。除了这短短的十四天之外,从1940年到1947年,我始终无缘返回英格兰。

我终于一偿回国夙愿。战俘的惊扰总算在此停息。我自此觉得,只要派得上用场,或是除此以外别无他途,我一定会把完整的意义放在人生各个环

① 阿比西尼亚(Abyssinia):即今之埃塞俄比亚。

② 外约旦(Transjordan):即今约旦王国。

节的组合上。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，这种态度比所谓的理性与智能更加长久。

甩脱外在的压力之后，我反而可以自由自在地寻找、重建被困战俘营时那段狰狞、模糊的岁月。大约在五年前，我第一次走进日本战俘营——位于爪哇岛的雷巴克山巴达(Lebaksembada)山谷，我就挣开某些羞耻感的束缚，“雷巴克山巴达”在巽他语(Sundanese)中，正是“巧夺天工”的意思。在四季不分、恍惚迷离的悠长时光中，我一再受困于我的苦恼之内：我的朋友、同胞在外面殊死奋战，而我却在监狱铁窗之内暗自凋零。

我暗自下定决心，如果我能活下来(当时看来机会实在不大)，我一定用我所有的时间来服务众生，绝对不计较个人的得失、一己的利益。不管生命如何伪装，如何纷扰混乱，如何低贱卑微，只要我能找到完整饱满的人生意义，我就不会对它说“不”。

被卷入世界大战之后，我始终认为这场史无前例的恶战是该全然否定的，是“不”氏父母生下来的问题儿童。可别小看这个“不”字，它是经年累月、精心筹划、内在激辩的成果。它论理清晰、意志果决，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直觉里，引领我们，不管外界是怎样的状况，都是不由自主的一声“不”！这个任性固执的“不”，迫使我们把一半的生命(原本是我们最具潜力、最强悍的盟友)，逼成最狡诈恶毒的死对头。

1949年的某个下午，我被传唤进入白厅^①的一栋附属建筑。主事者告诉我，在尼亚沙兰^②——我一直以为就是旧英属中非——有两个伦敦方面希望能多了解一点的地方。一个是保护领地(Protectorate, 指尼亚沙兰保护领地)最南边、崎岖广大的高原；另外一座也是高原，在平原、湖泊旁，陡然拔起八九千英尺，地形复杂、山势急转直下，位置在保护领地的最北边。这两块高原都有大片的未知区域，从来没人勘探过。偶尔会有热心的植物学家，孤注一

① 白厅(Whitehall): 前英国王宫, 现在是英国政府机关所在地。

② 尼亚沙兰(Nyasaland): 16世纪班图人开始大批移入马拉维湖西北一带, 并在马拉维及其毗邻地区定居, 1891年英国宣布此一地区为尼亚沙兰保护领地, 两年后改为英属中非保护领地, 1907年又改为尼亚沙兰保护领地。

掷的投机客与猎人,勇于任事的殖民地主管森林的官员或是其他政府官员,会上去看看,甚至还信心满满地描绘出自认精准的地图。但是,飞行勘探却显示,这些地图相当误导人(如果客气一点,不说他们造假的话),大概什么用场都派不上。

伦敦方面把这些零零碎碎的信息汇总起来,发现这些似是而非的信息,并没有什么价值,也因此,他们无法研拟具体的计划。

他们需要更确实、更新的信息,于是问我愿不愿意徒步上山走一遭,回来告诉他们具体的情况,不是在李文斯顿^①或是蒂波大人^②的时代,而是在让人心灰意冷的1949年。如果我已经准备好了,可以立即上路吗?拜托。

情势很急迫。世界的食物生产,特别是大英帝国与不列颠本身,正以几何级数急速地衰减,完全无力应付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。从最近阿根廷的情势看来,只要能协助英国摆脱对外粮食的依赖,不管是怎样的尝试,都是值得的,而且动作要快,迟疑不得。我即将探索的这个区域,说不定还帮得上忙。

我这么说,是希望你能明白:尽管我有自己的希望、盘算与决心,但我完全无法拒绝这个任务,因为这违反我心里笃信的真理。

至于我,还是得再次面对这个决定。潜藏在这个矛盾里的内在问题,不是轻易能够回答的。在我们这个沮丧年代有个特色:我们总是诚心诚意地为我们犯下的错误找出最完美的理由。我们是这个时代孕育出来的,不可能全然脱离它的巨大影响。有意识也好,无意识也罢,喜欢也好,不喜欢也罢,我们过的不只是我们的个人生活,更是时代的生活。我们是自己的黑暗马匹。每一天,在我们的言行举止之间,或多或少都透露了我们的动机与目的。举个例子来说,我们一天到晚把理性挂在嘴边——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里,从表面上,我们喜爱、尊崇、服膺理性,远远超过其他的世纪——但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,人类整体却史无前例地受到非理性支配,发动规模更大、死伤更惨

① 李文斯顿(David Livingstone):1813~1873,苏格兰医生与传道士,也是伟大的非洲探险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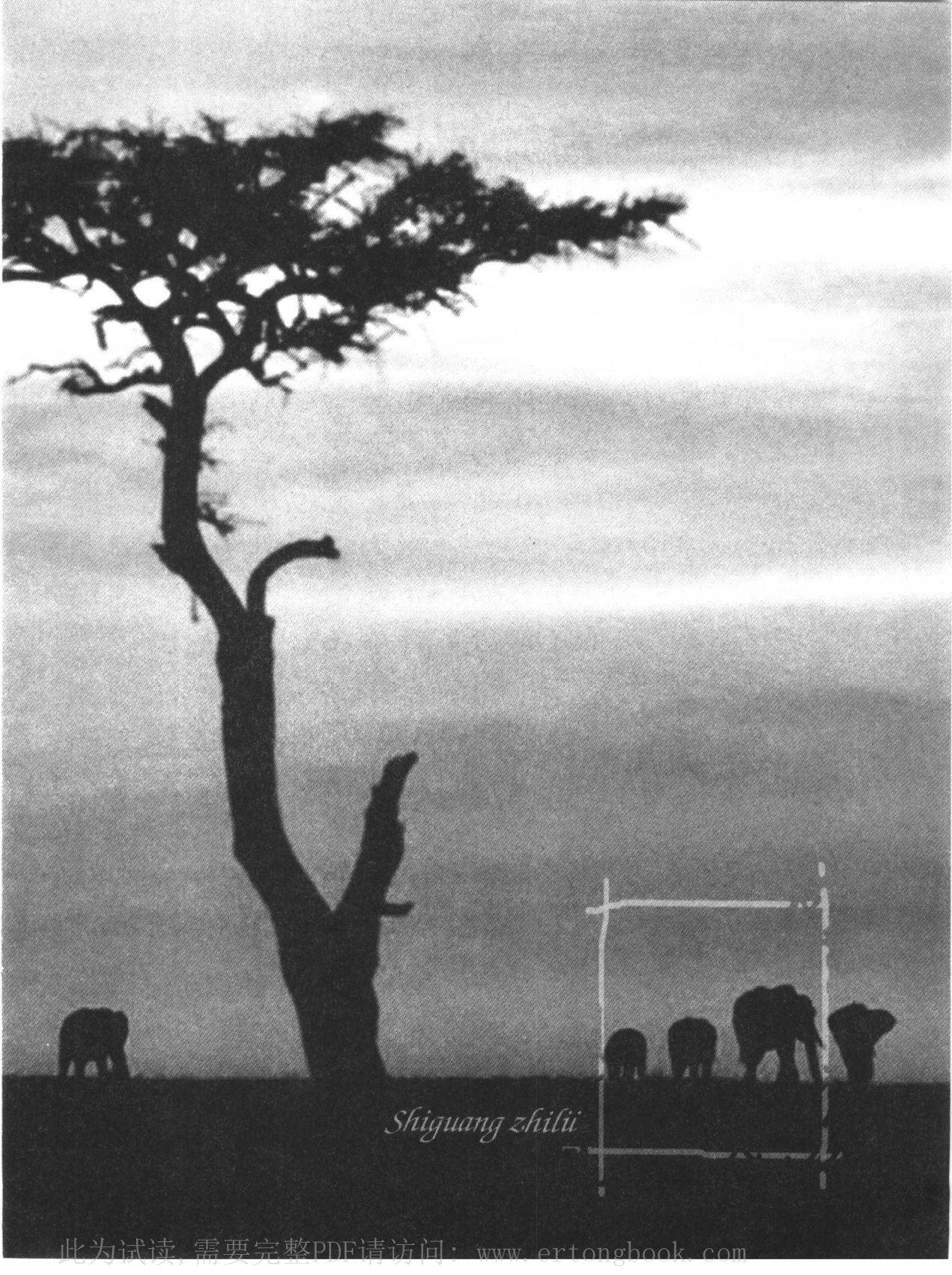
② 蒂波大人(Tippo Sahib):印度最后一个回教国王。

重、空前激烈的世界大战。

主题无需赘述。我只能说,我不管别人的口才多么好,又是多么的自吹自擂,强调他造福人群,我只会从他具体的所作所为去推断支配他的动机、意在言外的目的与深藏不露的计划。外在的趋势,可以验证他内心的思考模式。很明显的,在我们内心,有着我们全然陌生的动机与驱力:我相信这种势不可当的原动力(不管我们察觉到了没有),才是缔造结果的关键。

我不是说外在的因素、世上层出不穷的事件与形态各异的环境对结果没有影响。但是,这种观点长久以来就是主流论调,深获杰出思想家的青睐,现在到了还原真相的时候了。在这个关键年代中,我们另一面的生活,需要谅解与友谊的支持;由于我们的意识,被紧紧地封锁住,它只能藏身在各种结果的喜悦中,间接地、卑微地、秘密地吸引我们的注意。在精神的日落之处,我只能转过头来,在我们意识的地平线上,偶尔打量另外一面的生活,仿佛是荷马时代的船只被遥远的上古时代之风推得停不下脚步。

就我的情况来说,我一般不会只担心我笃信的真理。有时我也觉得,我不能把我一半的人生用在从非洲到欧洲,另外一半再从欧洲回到非洲,难道我这辈子就这件事情好做?在我的生命组成中,有无数相对的因素:意识与非意识、男女、阴阳,还有我体内分别来自父母的遗传,我倾向把矛盾放到一边,不强调做人。在我心中,“非洲”这个词,象征无意识、女性、阴柔与母亲;而“欧洲”完全相反:象征意识、男性、阳刚与父亲。



Shiguang zhilui